

高等教育大众化后高校转型发展之辩

□ 李宝斌 刘春花

摘要: 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后,受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的现实压力、“家国同构”的文化传统和管理机制的影响,有人提出了高校发展转型的话题。但发展模式转型,并不能保证有效化解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困境。高校人才培养的重点是培养具有潜质的准工作人员,而不是熟练工人、熟练技术人员。训练专业技能的最好办法是在实践之中,行业、企业在应用技术教育方面比高校具有更大的优势,企业在职业教育上不应该缺位,高校在职业教育上也不必越位。新形势下,全面转型容易导致高校职能的泛化,并掩盖其核心职能的发挥,适度调整比全面转型更利于高校的健康平稳发展,更加符合高等教育内在的发展规律。

关键词: 高等教育大众化;高校;转型发展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717(2014)06-0035-05

收稿日期: 2014-10-25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第54批面上资助项目“教学学术视域下的研究型大学教师评价机制研究”(中博基字[2013] 14号);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国家一般课题“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价研究”(BIA130060)。

作者简介: 李宝斌(1969-),男,湖南湘乡人,湖南文理学院副教授,芙蓉学院文学与社会科学系主任,华中科技大学教育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4年,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成为了本年度高等教育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有人积极支持、翘首以盼;有人冷眼旁观、不置可否;也有人担心又是新一轮“折腾”,忧心忡忡。到底是转还是不转,转往何处,如何转型,是转型语境下必须面对的严肃话题。

一、高校转型语境产生的时代背景: 就业形势严峻

所谓转型,百度百科的定义是“事物的结构形态、运转模型和人们观念的根本性转变过程。不同转型主体的状态及其与客观环境的适应程度,决定了转型内容和方向的多样性。转型是主动求新求变的过程,是一个创新的过程”。从20世纪末以来,中国高校的结构形态、运转模型、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一直处在转型之中,最先的转型语境是指从国家计划向受市场调节转型,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为了满足民众对高等教育的迫切需要,国家实施了高校扩招的政策。1999年,高校扩招的第一个年头,普通高等院校招生增幅达到42%。到2012年,普通本专科新生人数达6 888 336人,高中毕业生升入高等学校比例已经高达87.0%,普通本专科在校人数达23 913 155人。(教育部统计数据)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06年就达到了22%,初步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扩招虽然满足了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但人均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被严重稀释,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的质量保障提出了质疑,表达了担忧,这时出现了新的转型观点,即从外延式发展转向内涵式发展。为了加强对高等教育质量的监督和指导,还对全国所有本科院校开展了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工作。在“迎评”期间,各高校在硬件建设方面大幅度增加投入,硬件设施得到了很大改善。但软件建设仍不令人满意,毕业生的就业情况,遭到了多方批评。2014年,又有了新的转型探讨,即地方本科教育向应用技术教育转型。讨论的源头来自于2014年3月22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峰论坛上的发言。鲁昕表示,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将实行转型,向应用技术型转,向职业教育类型转。她还强调了技能型人才的高考和学术型人才的高考要分开等系列职业教育改革的问题。

根据布鲁贝克的观点,高等教育哲学分认识论

和政治论。认识论把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政治论认为，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1](P13-15)}。不难看出，我国近二十年来的高校转型是以政治论为基础的，转型的目的服务于政治和经济，其中“缓解毕业生就业压力”始终是重要目的，本次转型语境仍然与此密不可分。

二、高校转型语境的文化因素：“家国同构”的儒家文化

大众化时代的高等教育很少有人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多数人接受高等教育出于功利目的。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提高自己综合素质，以便毕业后谋得更好的工作，是绝大多数人的想法。令人遗憾的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后，虽然圆了更多人的大学梦，为更多人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是并没有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相应数量的体面工作岗位，就业压力日益严峻。这也是教育部领导提出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方向向应用型人才方向转型的重要原因。组织的转型是在内外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为了自身的更好发展做出的积极回应，是在组织的功能和职责悄然变化后，进行的积极主动调整。但我国高等教育的变革、高校的转型，基本上受外界的推动，主要是因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的高等教育政策发生变化，高校被动地服从和适应，不断调整发展规划，实施着一波又一波的转型。

在“家国同构”社会类型的基础之上，出于维护“国”之君权和“家”之父权的需要，教育成了一项重要的事业而备受重视，但与此同时也具有了很强的功利性目的。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下的教育自始至终同社会和国家保持高度的同构性^{[2](P14)}。加拿大教育学者许美德认为，“中国的政治领导者们似乎对于传统的模式难以放手，这些模式使他们能够对所有社会科学知识进行统治，这种统治权又通过法律得以永久的保障”^[3]。高校的主要职责包括职业训练、全人的教化、科学研究三个方面^{[4](P67)}，对学生的职业训练，帮助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是高校的重要职责。但受政治论的教育观念和家国同构的儒家文化影响，我们给高校赋予了太多的职责。比如，1999年，中央制定高校扩大招生计划的目标

是“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也可以说这四个目标成为了高校职责的重要内容。初步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后，因为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与日俱增，又把毕业生的就业率作为维护稳定的重要政治任务来抓，甚至在某些评估活动中，这一条成为了“一票否决”的依据。高校，特别是那些名气不大、实力不强的高校，资源有限，人力、财力不足，如果在毕业生就业率上投入太多，势必影响学校在教学与科研上的投入，而且，高校和教师即使费心费力，也很难为学生的就业做出具体的、实质性的帮助，如此一来，在主管部门的压力之下，弄虚作假的“被就业”是不得已而为之。其实，哪所高校不希望提高自己学生的就业率？哪个学生不想毕业后尽快找到合适的工作？高校学生在经过自己努力后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也能理解现实的残酷，就业困难并非个人的责任，并不能简单地把未就业归因到学生对工作岗位的挑剔，或学生的能力差，这有深刻的社会原因。毕业生不能正常就业或就业岗位不满意，大多能够坦然面对，很少因此而怨恨学校和老师，但非常反感学校“被就业”政策。高等教育主管部门或者出于外部的压力，或者急于表达自己的创新精神与责任意识，提出了一条又一条的高校转型发展的政策，离不开这种家国同构文化的影响，以及在此文化浸染下建立的管理机制的影响，致使高校的转型不是高校自身发展或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作用，而是在行政权力的驱使下进行的被动应对。

三、高校频繁“转型”的副产品：高校职责的泛化

“每一个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无论它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1](P13)}。传递、探究高深学问，是高校的核心职能。在高度发达和结构复杂的现代社会，高深知识并不只是一个层面、一种形式。一旦这种高深的专门知识运用于一个复杂的社会时，就会出现许多中间性的职业及相应的中间水平的学问。高等教育不再是狭窄深奥的，而是由许多种专门知识（有的较深奥，有的较浅易）组成的。正是这种新

型知识得到承认和扩展,才使我们的学院大门开得如此之大,以致提出了“高等教育为谁服务”这一问题^{[1](P76)}。转型社会,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在回答“高等教育为谁服务”时,高等教育质量内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质量不再是一种标准,而变成了一个相对的概念^[5]。它开始象任何产品和服务一样,更加关注消费者对它的满意程度。高等教育大众消费者主要是学生和政府,学生代表个体的各种需要,政府是社会各领域需求的集中反映者。随着高等教育对象的不断扩大和教育内容的不断丰富,高校也需要分层分类,分类和定位的标准应从高等学校的本质属性出发,即依照人才培养的逻辑,按照人才培养类型的不同划分高等学校的类型并进行定位。从大的方面讲,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的大学可称为研究型大学,这也应是平时我们所称的研究型大学的真正内涵;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大学可称为应用型大学;以培养技能型人才为主的高校可称为技能型高校^[6]。这些分类和定位都强调了高校的核心职责是人才培养,不同类型的学校培养不同类型的人才。但是我国高等教育近二十年的转变与转型,在不断增加高等教育和高校的职责,比如“刺激经济增长”、“拉动内需”、“缓解就业压力”等,都多少偏离了高校培养人才的核心职责,出现了职责泛化的现象。正如美国学者贝尔(1970)针对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导致了“教育膨胀”现象所作的批评:美国大学已经成为一个负担社会在其他地方所不能完成的各种任务的“垃圾场”^{[1](P76)}。在这方面,我们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吧。当高校职责泛化,其核心职责就被许多外生的次要职责所掩盖,核心职能很难正常发挥,外加的职责也理所当然不能顺利履行。在家国同构的文化和管理机制的作用下,又会发动新的转型,循环往复,恶性发展。这种不当的教育价值追求,使教育忘却了引领人之幸福的使命,导致人们学到了知识而不懂生活,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却失去了生命的华美^[7]。

四、高校转型的内部难题:高校独特的稳定性

“转变”、“转型”,是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语境下常用的词汇,但是高等教育有自己的发展规律,

发展过程中有相对的稳定性。大学的组织结构具有高度的稳定性,西方世界在1520年建立至今仍然存在的所有机构大约85所,它们有可以辨认的形式,有类似的功能,有不间断的历史,这其中包括天主教(教会)、马恩岛的议会和英国的议会、瑞士的一些州,以及70所大学^{[8](P86)}。也就是说,在西方世界近600年间的风云变幻之中,是大学,占据85所幸存机构的八成有余。“其他事物都变化,大学大部分持久”。它们偶尔通过其内部进行的活动促进了世界的改变,但它们自身改变得比世界其他部分要少得多。正如克拉克·克尔所说,“学术界,不论其卷入了何种特定的进程,它更多的是遭遇变革,而不是进行变革;变革更多的是无计划的,而不是有计划的”^{[8](P59)}。很少有机构在自身事物上象大学那样保守,而大学的成员对别的事物十分自由开明;有时在一个背景下最开明的教师在另一个背景下最保守。高校发展的相对稳定性并不支持高校职责的泛化,也不支持学校结构和培养目标的快速转型。

“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人性的改进、理性的培养、使人成为人、使人成为自由人”^[9]。正如赫钦斯所说,“大学唯一的生存理由,即在不受功利或‘结果’的压力牵制情况下,为追求真理提供一个天堂”^[10],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发掘人性的共同点,将人与人、现在与过去联系起来,增进人类的思维。因此,探寻人的共性,为走向自由提供更多的帮助,是高校追求的核心价值。正因为这样,欧洲大学一开始就把自由教育作为第一要务,即使在以实用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美国,时至今日,哈佛、耶鲁等老牌大学还一再重申自由教育的重要性。而中国的大学一开始就重实用,在自由教育方面有先天不足和后天的发育不良。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强调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转型语境来源于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虽然职业训练是高校的重要职责之一,但职业训练、全人教化和科学研究,是三位一体的。

“将一个方面从另外两个方面剥离出来,势必损害大学的精神实质,也必然殃及这个被剥离出来的方面本身。所有这三个方面都是一个活生生整体的必备要素。倘若将他们割裂开来,大学的精神将会枯萎凋谢”^{[4](P68)}。

如果地方本科院校向培养应用型人才方向转型,按要求必须大幅压缩通识教育内容以及本学科

的高深理论内容,加重技能、应用技术方面的教学内容,那么势必造成三位一体的失衡;如果说只在原有基础上向应用技术方面略作调整,就无所谓转型。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高校的相对稳定性,都不支持高校大幅度、快速度的转型,勉强为之,则会产生许多难以预料的后遗症。

五、高校转型的可行变式:适度调整

当前形势下,应辩证地看待高等教育质量观:一方面高等教育质量观并非僵死不变的,我们无需固守,而应该针对高等教育发展中的质量问题不断调整高等教育质量观;另一方面,高等教育质量观也绝不是权宜性的,即我们不能仅仅按照某一阶段国家层面高等教育发展战略,人为地设计高等教育质量观^{[2] (P15)}。在内外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高校不可能固守某些教条,不求发展;但伤筋动骨式的变革并不可取,根据具体情况和依照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进行适度调整,应该效果更好。有人认为,“质量标准的多样化是市场竞争和市场引导的产物,而不是行政力量规定或引导的产物。市场竞争是最好的一种质量约束机制,是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的基本来源……市场标准才是一种真正的‘实践标准’,市场检验才是一种真正的‘实践检验’”^[11]。但完全以市场为标准来检验高等教育也有不当之处,毕竟教育不是经济,高校不是企业,更多情况下,高校不是适应市场的发展,而应该引领社会文化,要有创新意识和创造精神。

新一轮的高校发展转型语境源自于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困难,同时某些企业又出现用工荒的现象,教育部有领导倡导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型转变。有调查研究显示,高校毕业生仅有35.41%的人认为所学专业与工作岗位对口,39.9%的人认为部分对口,还有24.69%的人认为所学专业与工作岗位根本不对口。一方面,反映了高校毕业生结构性的过剩,即毕业生的专业结构与现实的需求结构发生了比较严重的错位,这是地方高校发展转型的现实依据。另一方面说明,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对所学专业并不一定要求严格对口,宽口径更能适应市场的要求。调查结果还显示,大学生认为用人单位最看重的是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选择比例分别为

21.81%和20.54%。在对用人单位的调研中发现,用人单位最看重大学生的素质是:专业知识与技能、敬业精神、学习意愿与可塑性、沟通协调能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12]。这从另一个层面反映通识教育和宽口径的专业教育的重要性丝毫不比应用技术教育的要求低,高校教育的适度调整比大方向的快速转型更有合理性,更加充满生机。解放初期高等教育狭窄的“专业对口”培养的高校学生专业面太窄,留下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市场瞬息万变,而人才培养周期漫长——“百年树人”,高校如果为了实现所谓的“订单式”培养、“零距离就业”,培养的人才就很难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市场的变化。训练专业技能最好的办法是在实践之中,也就是说,行业、企业在应用技术教育方面比高校具有更大的优势,企业在职业教育上不应该缺位,高校在职业教育上也不必越位。高校培养的不是熟练工人、熟练技术人员,而是培养具有潜质的准工作人员,自由教育和宽专业基础教育的意义更大。

高深的专门知识运用于一个复杂的社会时,就会出现许多中间性的职业及相应的中间水平的学问。高等教育的多样化,要求高等教育不只是研究型高等教育与应用技术教育两者简单的二分法,不是回复到双轨制的学制上去,在职业技术教育与高深学术研究之间还有很多中间教育层次,还要有从应用技术教育到学术研究教育相通的阶梯。如果从高考开始就实行不同的教育模式和学习评价机制,势必会过早地造成两种互不相干的学制体系,两者之间缺乏沟通,不便转换,让一群心智还未成熟的学生过早地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做出规划,为自己今后几十年的发展承担责任,有失公允,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再说,化解就业率不高的出路,不只有强调高校的定位,强调应用技术人才、职业人才的培养这条唯一出路,加强高水平大学的建设,培养更多创新、创业型人才,开发更多生产线和新产品,就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能够更深层次地化解就业困难。据《中国青年报》2008年9月8日的报道,《美国大学博士学位获得者综合报告》对2006年度全美45 596名研究型博士学历背景进行分析,输送到美国读博士研究生人数最多的三所大学是:清华大学571人、北京大学507人、加大伯克利分校427人。此外,我国还有复旦大学、中国科大、南京大学、南开

大学、上海交大都在150人上下^[13]。这说明我国的研究型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还存在较大差距,在培养高精尖人才方面的能力还不强,在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方面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高深学问的研究需要低端教育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需要高等教育多样化、高校多样化。

其实,当今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大都明白自己的基础和处境,强调“以地方为依托”、“以就业为导向”的高校不在少数。在发展目标上,他们提得最多的是“在同类学校中处于领先地位”,几乎没有哪些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脱离实际提出要“建设国内一流、世界知名大学”。它们只需在职业训练方面再做适当的引导,多给支持和协助,而不是用行政的命令开展一波又一波的转型。也许反映强烈、讨论激烈的缘故,《人民日报》曾在2014年6月份刊出新的相关说明《教育部:600所本科学校转型表述不准确》,其中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介绍,国务院发文要推动一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转型发展的核心是要建立中国高等学校的分类体系,并不是简单地把新建本科院校转化成应用技术院校。

参考文献

- [1] [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
- [2] 高桂娟.论“多样化”高等教育质量观的中国境遇[J].江苏高教,2012(3).
- [3] [加拿大]许美德.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291.
- [4]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大学之理念[M].邱立波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 [5] 赵婷婷.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质量观的转变[J].江苏高教,2002(1):40.
- [6] 赵庆年,祁晓.研究型大学的基本职责[J].高教探索,2012(5):8—9.
- [7] 肖川.生命教育:内涵与旨趣[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3(4):32.
- [8] [美]克拉克·克尔.大学之用(第五版)[M].高鈺,高戈,汐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9] 张楚廷.高等教育哲学通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208.
- [10] [美]赫钦斯.美国高等教育[M].汪利兵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25.
- [11] 张应强.高等教育质量观与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J].江苏高教,2001(5):13.
- [12] 付薇.河北仅三成毕业生所学专业与工作岗位对口.
<http://yanzhao.yzdsb.com.cn/system/2011/09/24/011429083.shtml>.
- [13] 睦依凡.高等教育强国:大学的使命与责任[J].教育发展研究,2009(23):28.

Debating on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 in the Process of Massific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LI Bao-bin LIU Chun-hua

Abstract: In the stage of massification,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higher education. Some argue that universities should change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attach more importance to cultivating application-type talents. But this kind of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cannot solve the difficulties of graduate employment effectively. Universities train "high potential" employees, rather than skilled workers or technicians. The best way to training professional skills is in practice, industries or enterprises have more advantages in the aspect of the applied technology education than universities. The former should not be absent, and the latter should not be offside in occupation education.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a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easily leads to generalize university functions, and cover up its core function. After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it shows that a moderate adjustment is in favor of the healthy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 than a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It is also good for meeting the inner rule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Key words: massific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ransformation of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 黄建新)